

红色散文镌刻百年壮阔历程

□ 古 帮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是一项举世瞩目的辉煌壮举,是一次意义空前的伟大创造。这一壮举和创造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古老中国的面貌、境遇和命运,以及它的世界影响和国际地位,而且还真正唤醒和振奋了国人的精神、意志和诉求。

向往光明、追求进步的广大知识分子,包括职业革命家,在投身壮阔时代洪流和火热社会实践的同时,满怀激情,敞开心扉,推出了一系列传播先进思想、呼唤社会变革、展示历史图景、表达人民心声的散文作品。这些作品凭借崭新的精神内涵和独特的审美风范,以及巨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构成了百年中国历史上的一道常读常新、青春永驻的文学风景线——红色散文。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砥砺前行中催生的精神之花,红色散文自有强大而稳定的意旨基因和价值取向,但就其审美表达的物象与方式而言,分明是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既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瞻远瞩,抒情言志,又有一代代革命事业后来人的嘉言懿行,高风亮节;既有峰回路转、曲折回旋;既有踏上革命圣地的绵绵思绪,又有沉吟红色经典的涌动情潮……所有这些溢彩流光,在历史天幕上交成红色散文缤纷生动的艺术景观,同时也自然地呈现出属于它的突出个性与鲜明特点。

透视一隅探寻文化的肌理

——读朱法元“幕阜叙事”系列散文

□ 毕 海

幕阜山古名“天岳”,大禹曾登此治水,“三苗”“九黎”在此起源立国,三闾大夫在此魂归汨罗,惠南禅师在此开宗立派,秋收起义革命枪声在此响彻,花灯古戏名人非遗……朱法元“幕阜叙事”系列散文《天岳》《山魂》(知识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通过细致梳理和精心勾连,让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幕阜山显现出厚重的文化分量,充分彰显中华文化的悠长、力度和复杂情态。

在《天岳》中,作者以家乡幕阜山区为审视对象,从地方文化构成所包含的“地灵”和“人杰”两方面展开爬梳,呈现幕阜文化的前世今生。“地灵”篇围绕幕阜地区的名山古刹进行钩沉,通过今昔对比的观察和慨叹,将幕阜山区自然风光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娓娓道出。从幕阜山、黄龙山、大雾山到汨水源、石钟山、西坡岭,作者关注自然风光的雄奇险峻,更关切风景背后的幕阜文化韵味和历史流变。“人杰”篇以时间为纬,细腻勾勒幕阜山的历史文化精魂,提炼出幕阜文化的内涵、形态和价值。由魂归汨水的伟大诗人屈原、杜甫到双井之子黄庭坚,从爱国名将方琼到现代古琴艺术家查阜西,从石钟山英雄罗孝芬、汤明到当代“工匠精神”代表宁红掌掌门俞旦华,夹叙夹议,既表达对幕阜文化贤贤及当代精英的崇敬和赞颂,同时展开对文化传统的审视和反思。借由对幕阜山文化基因的深入考察、探寻和思考,《天岳》完成对幕阜文化历史传统整体性的构建。

如果说,《天岳》意在唤醒山魂,钩沉幕阜山历史,那么《山魂》则旨在记录乡愁,展示山乡现实风情。一方面,新时代的幕阜山区在现代都市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下,不可避免地受到侵袭,山村面临现实困境,包括“留守妇孺”的无奈、山民生活的艰辛、面子文化的可悲可叹、不良习气的蔓延、欲望的疯狂扩张等,让作者感慨

彰显思想的光芒与理性的力量

在文学样式中,散文具有显见的“我思故我在”的特征,这决定了优秀的散文篇章,理应承载具有真理品格、能够昭示历史进步和人类解放的观念形态,以此启迪和引领人民群众自觉投身于伟大的时代变革和社会实践,同时也为红色散文注入真理的血脉和文化的滋养,使其在整体上站到了历史高处和时代前沿,彰显出思想的光芒与理性的力量。

李大钊的《新纪元》和《新的!旧的!》发表于“五四”之前,或敏锐揭示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性与“不协调性”,或热情呼唤全世界劳工阶级的崛起,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类新纪元、新文明,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应运而生进行了舆论铺垫。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为悼念张思德同志而作,文章不长,但高屋建瓴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性质、任务和奋斗目标宗旨,宣示了革命者特有的生死观和价值观,从而成为共产党人永远的纲领和经典。陶铸的《松树的风格》和《革命的精神生活》,聚焦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其中阐扬的远大理想、高尚情操和坚强、乐观、无私忘我的“松树”品格,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是确立自身的根本标志。梅岱的《明斯克钩沉》记述作家的白俄罗斯之行,其跨越时空的见闻与思考,精辟析着当今世界的发展变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遇到的严峻挑战,同时又满怀信心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启社会主义新时代和新长征的豪迈情怀。

新时期以来,多位作家学者不

约而同地写下拜谒或重读马克思的文章,其中聂锦芳的《在(资本论)产生的地方》、朱增泉的《缅怀与思考》、梁衡的《特里尔的幽灵》等,均以新颖的见识丰富和深化着人们对真理的认知。华罗庚的《写给向科学堡垒进攻的青年们》、刘亚洲的《精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王巨才的《回望延安》、韩少功的《万泉河雨季》等,都承载了足够的思想光泽和精神重量,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意义,给人以启迪乃至震撼。

人物形象立体而鲜明

文学是人学。文学作品必须写人,小说是这样,散文亦复如此。不过同样是写人,小说和散文仍有区别:小说重在塑造客体的人物形象,而散文则更多披露作家的内心世界——散文有时也写客体的形象,但这些客体人物仍然浸透了作家直接的目光打量与情感评价,是作家心灵的延伸。唯其如此,我们才常把散文看作一个人的心灵史。而在这一维度上,红色散文同样多有佳构。

细读朱德《回忆我的母亲》,文中的老人家辛勤劳作,艰难持家,自己是穷人还不忘周济比自己更穷的人,对于儿子从事的革命事业,给予默默的支持。文章结尾处,作家把母亲与千百万劳动母亲联系起来,深情写道:“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时,作品显示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质朴本色与博大情怀。

《可爱的中国》和《清贫》是方志敏在囚室里写成的红色经典。

作品对恶魔残害祖国母亲的猛烈抨击,对未来中国美好前景的殷切呼唤,对生命追求与个人操守的坦荡告白,把共产党人的肝肠与初心表现得酣畅淋漓。邹韬奋在生命最后时刻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这使得一篇短短的《遗嘱》,尽显信仰的崇高与信仰追求的美丽。

刘白羽的《长江三日》记述作家乘江轮顺流而下的经历,笔端呈现的或激流勇进或从容安详的情景,是三峡的性格,更是作家革命理想主义精神与激情的外化。李健吾的《我有祖国》透过“我”在外国和旧中国的遭遇,表达了新中国成立带给自己的幸福和自豪。李若冰的《柴达木手记》,通过描写西部大地沸腾的劳动场景,传递出作家对社会主义建设者以及壮丽山河的深爱与礼赞。而一部《雷锋日记》则直接敞开了人民好战士的内心世界,使我们懂得了什么是“平凡而伟大”。

周立波的《韶山的节日》、魏钢焰的《忆铁人》、梁衡的《大有大无周恩来》《方志敏最后七个月》、丁晓平的《老渔阳里2号的百年时光》以及沈俊峰写邓稼先的《假如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等,虽然都是隔着时空为伟人和英烈画像,但由于作家进行反复的现场采访和细致的资料爬梳,同时又注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写作态度,所以同样具有很强的真实感和可信性。由此可见,优秀的红色散文可以视为文学版的党史,它同样具有信史一般的认识价值和恒久生命。

饱满的精神升华与情感绽放

红色散文所高扬的精神旗帜,

从来不是一种预设的、外部的存在,而是作家源于内心的真诚表达。许多红色散文家,首先是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和践行者,是无怨无悔的革命者。对于他们来说,驱笔为文不是寄托才情,更不是博取名利,而是基于理想、使命和责任,以笔为旗,直抒胸臆,是在斗争和工作中的精神升华与情感绽放,正所谓“血管里流出的总是血”。这样生成的散文之花,自然别有神采和魅力。

散文可以有必要的合理的艺术虚构,但绝不能仰仗和放纵虚构。尤其是当散文作为相对完整的历史侧面或时代画卷加以呈现时,其形象的真实感和本质的可信性,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艺术品。在这方面,红色散文又一次显示了自身的不同凡响。一批作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引,以严格的现实主义精神和非虚构手法为武器,充分调动个人介入历史与现实的独特资源和优势,留下了一系列具有历史现场感和艺术真实性的作品。

陆定一回忆红军翻越瑶山的《老山界》、魏巍速写抗日战场的《黄土岭战斗日记》、东平报告新四军挺进敌后的《向敌人的腹背进军》、萧子描写志愿军战士的《激渡》、杨得志的《强渡大渡河》、荒煤的《奔向延安》、杜鹏程的《夜走灵官峡》等,作家就是作品中的人物,同样具有很强的真实感和可信性。由此可见,优秀的红色散文可以视为文学版的党史,它同样具有信史一般的认识价值和恒久生命。

以饱含情感的审美目光回望故乡

——读散文集《望乡书》

□ 李 壮

“西王善是个村庄”,这是雪野《望乡书》(山东文艺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的开篇之句。这个开头有意思。按照惯常的想象,这话大概应当说成“我的故乡是西王善”——强大的“故乡”概念同具体地名明确对位,像两块强力磁铁一样,一拍即合。然而雪野不这么说。在开口以前,雪野似乎已经预设了一位隐含读者,并让他提问:请问,故乡是什么?答曰,(我的)故乡是西王善。再问,西王善又是什么?雪野只好老老实实地说,西王善是个村庄……

这样一个开头,折射出雪野在讲述故乡时庄重、谦和的姿态,也暗示了故乡主题自身的复杂。我想,这个在文本背后提问的读者,或许便是雪野自己。西王善是什么?故乡又是什么?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并不容易回答。地理和行政区划上的定义当然是清晰的:“她位于齐鲁腹地,准确地说,在济南市莱芜区张家洼街道。”但文学要挖掘的,其实是这种清晰背后更驳杂、更广阔、更隐秘的经验内容和情感蕴藏。于是,说“西王善”,还得从邻村“东王善”说起,而“东王善”得追溯到明朝洪武年间的“王神寺”,相关的是“王氏善人”,与王氏对应的有吕氏、李氏,于是又延伸到居民构成、自然风光、河流道路,以及村中几百年的古槐……《望乡书》的主体内容,就这样一路关联、铺展开来,故乡的形象随之丰满清晰。

在雪野笔下,故乡是无数的人和事物,并在这些人和事物之间,建立起多样而亲切的关联。《望乡书》试图重建一个记忆王国,而重建的方式,正是对故乡世界里的人与事物展开凝视,对其内在的关联性不断挖掘重构。因此,在最直观意义上,我愿意把《望乡书》形容为“乡村生活撷英”:它的内容如此丰富,对故乡的不同侧面,如地理风光、资源物产、生活生产、民风民俗等,都进行了细致的甚至带有博物学色彩的呈现。作者在书中耐心细致地回忆着故乡人事,勾勒着乡间少年那些趣味盎然的生活细节,其形态是片段的、方式是跳

跃的,却充盈着内在的关联感和总体性,如同花瓣之于花朵、星辰之于银河。

其中有些“花瓣”和“星辰”是我特别钟爱的。例如童年乐事。童年之“乐”,大抵离不开“游戏”和“吃”。雪野对这两类乐事都娓娓道来,前者如打沙包、“抗拐”,后者有捞鱼、摘杏、刨地包、折槐花等,更有甚者,两类乐事合二为一。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这类“乐事”其实兼具了“能量释放”和“能量补充”两大乡土童年经验核心内容,并且带有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作者还经常在童年视角和欢乐气氛中,巧妙加入对生活与人生的窥探速写。例如,“挖河蚌”之后,还有“卖河蚌”的故事。毫无销售经验的爷爷既不知道如何定价也不知道怎么吆喝,有人问价时只好说“恁看着给吧”,甚至好人做到底,“带着我和弟弟端着两盆河蚌跑了二里地”,给买家送到了楼下。这其实是商品经济浪潮初期关于“还得可爱的买买人”的生动素描,趣味横生而又见微知著地写出了生活经验的时代变迁和农民身份的转型过程。至于“乞丐”“老嫗”“弃妇”“哑巴”生活写的“人间苍凉”的章节,生活的苦难经过少年纯真、善良、充满共情的视角过滤,其沉重也被审美化了——它们变得“哀而不伤”,有时甚至还多了几分淡薄的暖意和盼望。这种对人情、人性的点滴

记录 and 细腻擦洗,常常被雪野融入民俗经验书写之中。

古今中外,怀乡之文汗牛充栋,但恰恰是在这些地方,雪野的“望乡”闪耀出鲜明的时代性和历史感。很多沿袭千百年的耕作方式、生活规律、聚居形态,雪野都“望”到了其历史的“尽头”。《望乡书》之“望”,是从都市回望乡村的“空间之望”,更是“时间之望”。从传统乡土想象到现代乡村生活,他站在历史时间的巨大拐点上,见证了“历史的终结”,也记录了“时间的开始”。而作为讲述者的雪野自身,可谓经典“乡土中国”的最后一代传人,承载并记录了许多即将消失的生活经验。同时,他又是“新乡土”走出的第一批中产,对历史的结构性变化有充分的知悉和把握,并向故乡投去饱含情感、充满穿透力的审美注视。

在从容、自由、绵长的语调中,雪野呈现的早已不再是狭义的故乡,而是历史的见证物、身份的承载物、文化的象征物。学者段义孚在《空间与地方》一书中认为,亲切的地方经验因其深刻性和重要性而成为文学的天然对象,“每种文化都有它自身亲切性的象征物,这些象征物得到了其人民的广泛认同……地方的形象是通过对感觉敏锐的作家的想象力形成的。通过他们的艺术光辉我们才有幸品味到那些人们原本已经淡忘的经验”。这是故乡主题书写的永恒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作协创作部)



雪野写道:“西王善这个小村庄,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关于她的记忆,丰富、杂糅、深刻,充满了甜蜜与忧伤。”图为西王善村街景。选自《望乡书》

重新打量记忆深处的碎片

——读散文集《对坐》

□ 栾梅健

江苏青年作家孙月霞的人生以18岁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18岁前,她在泰州姜堰农村的一个普通家庭生长、读书;18岁后考上大学,后来又考上研究生,留在美丽的苏州工作。地域的变迁,身份的转化,使她真切地感受到社会现实的差距。收录在散文集《对坐》(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中的几十篇散文,尽管分为“万物皆有归宿”“云淡风轻”“公寓房”和“对坐”四辑,然而总的基调却大都是对生养她的故乡的深情凝望,重新打量记忆深处的碎片,并寄予了浓浓的悲悯情怀。

《吃食》一篇,写的是她工作的苏州相城区诱人的美味。这里有令人爱不释手的黄辣天福瓜子,有煮不烂、特别爽滑的秘制面条,还有被誉为苏帮菜起源的鸡汤碗。正当她陶醉于苏州美食的丰富时,陡然间想起家乡,想起了父母和童年:“在相城吃饭,总是让你想起家乡,想起小时候。”这种如影随形的感觉,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就会涌现出来。她在《年里的寺庙》一文中坦言:“本文的乡村图景,不常在我们的叙事之中,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成长的底色和背景,是中国的乡村大叙事……”这种浓得化不开的乡情,贯穿在这本散文集的几乎每一个篇章中。

《听来的家事》是作者集中描写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和姑姑等长辈的一篇长文。她说:“我这样讲述的时候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又觉得无从吐起。我不知道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语气、表情和态度来叙述这样的故事,我生怕亵渎我的先人。”作者生于改革开放年代,生活如花般般地盛开,但伴随这些长辈的却是兵荒马乱的战争和无休止的饥荒、死亡的能力——致我的舅爷爷《麦田的收割者——致我的大伯》《老去的树叶终将飘零》等篇,也都是记叙自己长辈、村里老人的故事。这是有着年龄鸿沟的回忆类散文。她熟悉他们,了解他们,外出工作后魂牵梦绕的也是他们。当她在她以“局外人”的身份,再来重拾早年的记忆并发出无限感慨时,其实已不是在抒发个人的情感,而是在表达着对一代人的同情,也是在庆幸与拥抱这个时代的安稳。由此,这本散文集也就有了为时代留痕的价值。

对于故乡,难以忘怀的自然还应有童年时的玩伴与发小。《表姐的幸福人生》中的表姐其实并不幸福。她复读了好几年,最后只是考了个电大,在一家单位打扫卫生,在学门口卖东西。《小勇》中的小勇,一做小时的勇敢,早早从小家出来,先做房产中介,后开出租,然而孩子就是在城里上不了学。在这部作品中,有的只是平平常常的普通人。作者的描写之中有着深深的忧思。

《对坐》的文字总体上干净、淡雅,时有隽秀之句。“三十年前,我和我的小姨也是那样坐在家门楼的棵柳树树下,在那些绵长的夏天的黄昏,空气燥热或者有微微的风,大人们抓紧这点时间下地劳作了,我们便是那么多余,只是等待一顿不太精彩的晚饭以及随之而来的又一个漆黑的夜晚。”属于回忆,属于纪实,不经意间又有淡淡忧伤。显然,作者在语言运用上更趋成熟了。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